



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四十朵玫瑰

Vierzig Rosen

Thomas Hürlimann

托马斯·霍利曼 著 范捷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四十朵玫瑰

Vierzig Rosen

Thomas Hürlimann

托马斯·霍利曼 著 范捷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朵玫瑰/(瑞士)霍利曼著;范捷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

(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Vierzig Rosen

ISBN 978-7-5327-5924-8

I. ①四… II. ①霍…②范… III. ①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4056号

Thomas Hürlimann

VIERZIG ROSEN

© Amman Verlag & Co., Zürich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by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bilgerverlag GmbH, Zürich

本书得到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赞助

图字:09-2012-123号

四十朵玫瑰

[瑞士]托马斯·霍利曼/著 范捷平/译

责任编辑/裴胜利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188,000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5327-5924-8/I·3516

定价: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总序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期间以及在之后的几年里,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精选出的瑞士当代优秀德语作家的文学作品将陆续在上海译文出版社面世。这个文化交流项目在瑞士文化基金会安·萨尔维斯贝格(A. Salvisberg)女士和柏林文学研究会(LCB)乌·雅内斯基(U. Janetzki)博士的倡导和支持下得以实施,中国读者将会在这个当代文学系列中充分感受今天瑞士德语文学中所蕴含着的鲜活的文化记忆,体验当代欧洲社会生活的多棱面折射,感悟世界各地同时代人的情感和命运。

说到瑞士的德语文学,我们很快就会想起在苏黎世家喻户晓的高特弗里特·凯勒,想到他的《绿衣亨利》和《马丁·萨兰德》。凯勒在他的小说中,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向世界展现了阿尔卑斯山上这个小小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画卷,描述了个体在社会形态变异中的心路历程。凯勒在十九世纪就已经为瑞士德语文学奠定了在整个德语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的瑞士德语文学群星灿烂。他们中间不仅涌现出了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施皮德勒、黑塞那样的经世作家,也蕴藏着像罗伯特·瓦尔泽那样鲜为人知、却又充满神秘和狡诡的现代主义文学瑰宝。著名的文学双子座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更是为瑞士德语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这些作家在中国都有广泛的译介,深受中国的外国文学读者的喜爱。然而,我在这里使用的“瑞士德语文学”概念却蕴含着某种悖论,因为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了瑞士德语文学在存在中的不存在,或者说是在不存在中的存在。

我们若用罗伯特·瓦尔泽语调来说,假如有一种文学叫做瑞士德语文学,那么它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渺小得几乎就像片片飘逸的雪花,然而正是那片片雪花所具有巨大的力量,染白了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对于任何一个瑞士人来说,地球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二都是国外,因此毫不奇怪,二十世纪以来的瑞士德语作家几乎都必须融入整个德语地区,或者融入整个世界。洛桑的文学理论家彼得·冯·马特曾经说过,瑞士德语文学是一种语言区域文化相互作用下的某种效应,瑞士籍的德语作家若要成功,那么他们必须要在其他德语国家得到认同,在那里摘取文学的桂冠。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仅有五百万德语人口的瑞士无法为德语文学的接受提供足够的疆土和阅读人口,如果说要对瑞士德语文学做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它首先是属于德语的,其次是属于德语国家的,再者是属于欧洲的,最后则是歌德意义上属于“世界文学”的,因此它也是属于瑞士的。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近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创作的视角、涉及的主题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世界、生活和命运都远

远地超越了瑞士的疆界。

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2008年初夏,我和宁波大学的陈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壮鹰、张帆,浙江大学的李张林等诸位同仁应瑞士文化基金会和柏林文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瑞士当代德语作家的译介和文学交流项目。2009年的初春时节,我与几位同仁去了苏黎世近郊小村,一个叫“罗伦译者之家”(Übersetzerhaus Looren)的地方,目的是与几位当代瑞士颇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那次我们还有幸与柏林文学研究会的雅内斯基博士一起专程去苏黎世拜访了瑞士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记者、国际社会活动家胡戈·罗切尔(Hugo Loetscher)。其实,罗切尔应该算是迪伦马特和弗里施那个时代的作家,或者说也是积极介入瑞士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那一代瑞士知识精英,他的早期作品如《污水》(1963)、《编花圈的女工》(1964)、《大橙子里的秋天》(1982年)等均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和讽刺特点。

那一年春天雪很大,罗切尔的手摔伤了,他的左手缠着石膏和绷带跟我们见了面,在苏黎世老城区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文学往事,他的步履有些缓慢,他告诉我前几天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手骨折了。那天晚上,他邀请我们在苏黎世内城的一家古罗马风格的饭店里一起吃了晚餐。遗憾的是那次见面是我们最后一次聆听大师的教诲了,就在那年8月,罗切尔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他正在阅读总结自己一生的自传《我的时代是我的时代》(2009)一书的样书,现在想来,这个不带问号的书名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自信,也是对历史和未来的焦虑。他的去世无疑是德语文学界和瑞士知识界的

一大损失。

我在与这位诙谐幽默、善谈的长者关于瑞士德语文学的交谈中感受到他对世界的热爱,尤其是对中国的热爱,从上世纪80年代访问中国之后,他便不断地关注中国,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日耳曼学者和外国文学爱好者交流。我从他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世界情怀”,也许这是他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积极地活跃在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从事采访和写作而留下的“痕迹”,或许这种“痕迹”也代表了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某种共性。

然而,罗切尔是瑞士社会政治舞台上最后的勇猛斗士。今天的瑞士德语作家已经远离了迪伦马特和弗里施对瑞士本土的政治敏感和社会批判。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人类今天和现在对历史的文化记忆,他们关注主体个人生活的本身,而且是一种超越瑞士疆域的跨文化生活本身,关注人类共通的主体间情感与交往经验,关注对日常琐碎生活程式的反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托马斯·霍利曼(Thomas Hürlimann,《四十朵玫瑰》2006)、克里斯蒂安·哈勒(Christian Haller,《好年代》2006)、乌尔斯·费斯(Urs Faes,《爱情档案》2007)、阿道夫·穆斯克(Adolf Muschg,《孩提婚礼》2008)等。

2009年,伊尔玛·拉库萨(Ilma Rakusa)发表了小说《更多的海》,并且获得了当年的瑞士最佳图书奖。这部小说采用了碎片和断章的方式回忆了作家在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童年生活,随着家庭的迁徙,拉库萨的小说犹如茨冈人的大篷车,载着她的遭遇、记忆和情感走遍了欧洲各国,布达佩斯、卢布尔雅那、德里雅斯特、苏黎世,以及她在巴黎、列宁格勒的学生生活。“我是一个永远漂

流的孩子”。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了拉库萨默默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陌生人的新奇和恐惧。

这种对个人经验的关注也表现在当代瑞士文学系列所精选的作家作品中,比如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我是在瑞士“罗伦译者之家”认识施塔姆的,在译者与作者交流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在阿尔卑斯山的烈烈寒风中一起抽烟,因为“罗伦译者之家”是高科技环保建筑,所以我和他只能融入大自然了。他的口音似乎并不太瑞士,这大概是因为他曾在纽约、巴黎、柏林、伦敦等地居住多年,那些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瑞士童话《海蒂》的话题,因为他自己曾改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现代版《海蒂》读本,他对《海蒂》在中国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表示出惊讶。施塔姆第一部小说叫《阿格尼丝》(1998),次年这部小说就获得了奥地利萨尔茨堡劳利泽文学奖。2006年,他的小说《如此一天》问世,同样获得很大的成功,被先后译成五种文字。

《阿格尼丝》以美国为叙述场,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了“我”与美国女孩阿格尼丝之间发生的个人恩怨与情感。小说所关注的是写作与现实、文学意念与生活真实的双重性,以及个人情感与理性、责任的关系。作者以非常洗练的语言,独具一格的构思,使现实与虚幻随着主人公“我”的“小说创作”而交替变换,让主人公自私的灵魂不断接受着严酷现实的拷问。长篇小说《如此一天》是施塔姆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故事围绕客居巴黎的瑞士籍德语教师安德利亚斯与几位法国女人之间展开。作者再次娴熟地描写了爱的无力、主体的苍白以及个体对伟大感情炽热的渴望。

我和莫尼卡·施维特(Monique Schwitter)也是2009年初春在

瑞士的“罗伦译者之家”相识的,当时她挺着大肚子,我很难想象她竟是著名的汉堡大剧院的话剧演员。我们一起谈论她的创作和作品,谈论她的《耳朵没有眼睑》。说施维特是瑞士人我开始几乎都不相信,因为她的口音显然是汉堡的,只有她在跟瑞士同乡说话的时候,她才说一口我完全听不懂的瑞士德语。施维特 35 岁的时候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假如在鳄鱼边上飘雪》(2005),就像她的演员职业一样,施维特的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角色戏剧性,她总是把叙述主体打扮成各种各样人物,或者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采用各种叙述视角的转换,在文学这个世界大舞台上表现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我在阅读中常常想起罗伯特·瓦尔泽和他的小品文,毫不奇怪,她的《假如在鳄鱼边上飘雪》2006 年就获得了罗伯特·瓦尔泽文学奖。看来她喜欢在书名上做文字游戏,鳄鱼生活在不下雪的地方,这点是常识,假如鳄鱼见到了大雪,那么这条鳄鱼一定是在动物园里,一定是在桎梏之中,同样,她的长篇小说《耳朵没有眼睑》(2008)也是表达了叙述主体的生存桎梏,表达了叙述主体如何对生活真谛的探索和对个体自由和解放的渴望。小说采用侦探悬念的手法和元叙事方式,描绘了苏黎世普通人的众生相,表面的日常生活如爱情、同性恋和人际交往掩饰下的吸毒和凶杀。我们相约 2010 在杭州再见,并带上她那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她答应了。

记得和罗尔夫·拉佩特(Rolf Lappert)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浙江大学的灵峰山庄,当时他受我之邀来给浙大德语专业学生讲学,朗诵他的小说片段《游泳回家》。那是 2009 年 5 月的一天,为了给他接风,我去敲他的门,他穿着睡衣出来开门,长途跋涉给他留下了一脸疲倦。我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原来他和许多瑞士德语作家

一样,也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曾经在巴黎生活多年,周游亚洲和加勒比海国家,2000年后在爱尔兰的港口小城利斯图威尔定居。拉佩特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小说《接下来的那些日子》(1982)、《路人》(1984)、《走失者之歌》(1995)和诗集《旅馆房间里的浪漫》、《泳者的视野》(1986),拉佩特的代表作是鸿篇巨制《游泳回家》(2008),这部小说2008年虽然进入了德国最佳图书奖的最后竞争,但未能折桂,然而几周后,小说便获得了同年瑞士最佳图书奖。小说叙述了离开家园后的个体对精神故乡的向往,小说以幽默、冷峻的语言表达了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共同话题:寻找自我,在日常生活话语中寻找自我。小说以少年维尔布的成长过程为线索,以多种叙述视角和时空变换,表达了成长中的少年对自身的困扰和对世界的疑惑。

时隔一年后,也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陈壮鹰、陈巍又一次来到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罗伦译者之家”。在那里我们又结识了两位青年瑞士德语作家,丹尼尔·戈奇(Daniel Goetsch)和卢卡斯·贝尔福斯(Lukas Bärfuss)。戈奇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典雅的欧洲人,他在苏黎世长大,却来自我客居13年之久的德国首都柏林,鉴于我们俩共同的柏林情结,我显得有些激动,但他的谈吐似乎过于腴腆。我们围坐在“译者之家”面朝阿尔卑斯雪山的大客厅壁炉跟前,热烈地讨论着他的长篇小说《本·卡德》(2008)。客厅整面的落地窗外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娓娓地给我们讲述着这部与他的家族历史相关的文化记忆小说。《本·卡德》反映了有着非洲血统的卡德家父子两代法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情结,小说通过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叙述路线,营造了凝聚在叙述主体身上

的西方与东方、历史和现实、虚幻和真实二元相悖互动的现代主义文学叙述架构,表达了殖民、权力、种族、性别范畴内的文化话语冲突,以及作者对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困扰和焦虑。戈奇的另一部小说是《沙心》(2009),写的是一个联合国观察员弗兰克在阿尔及利亚西撒哈拉沙漠难民营的经历,来自发达国家的男男女女与西撒哈拉难民、贫困、毒品、娼妓、黑市相遇,理想和希望在沙尘暴中遭到颠覆。东克尔的出现唤醒了弗兰克对美好爱情、对过去的生活记忆。理想只有从自身的经历中才能感知,这是弗兰克在记忆中获得的认知。

与戈奇不同,贝尔福斯却给人一种风风火火的感觉。他以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头发似乎特意有点乱,西服里面穿着色调极不般配的运动式翻领毛衣,有一边的领子永远是翘起的,说话时苏黎世口音分外浓重,他那敦实的形象让人感觉与他的名字本意很符合——“熊爪”。他告诉我,他是图书商出身,读的是职业学校,成绩平平,后来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剧作家或者作家,于是就成了剧作家,写了小说。他觉得自己会成功,于是就成功了。他觉得他的艺术道路就是那么简单。贝尔福斯的代表作是《百日》(2008),这部小说使他一举夺得2009年瑞士席勒文学奖和2009年雷马克和平奖(特别奖)。《百日》也是一部非洲小说,贝尔福斯告诉我,他曾经非常向往美丽的卢旺达,因为他儿时曾在课本中认识过这个风景如画的非洲国家,后来他去了卢旺达,却被那里的政治动乱、贫困和腐败、民不聊生的景象所震惊。他的处女作《百日》描述了瑞士援非人员大卫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所见所闻,他与胡图部落女人阿伽特的情爱以及他在1994年卢旺达胡图

与图西种族大屠杀中的经历。美变成了恶,善行造成了兽行,女人成了疯狂的屠夫。小说在 80 万生灵涂炭的血河中反思、拷问、批评了西方彻底失败了的援非政策,对西方价值观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权力话语机制,对因此而歪曲了的人类道德理性提出了质疑。

2011 年的冬天,我在苏黎世结识了托马斯·霍利曼,他从柏林克罗茨堡赶来见我们这些中国译者。我们一起参加了在苏黎世郊区的一个市民俱乐部举办的朗读会,他朗读了小说《四十朵玫瑰》(2006)的片段。我告诉他,我的任务是这部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很高兴,还跟我一起接受了瑞士国家电视台的采访。

霍利曼出身于笃信天主教的政治望族,父亲汉斯·霍利曼在 1974 至 1982 年间任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委员,并在 1979 年出任瑞士总统。霍利曼的作品有两个特点,第一,他的作品与瑞士二战期间历史密切相关,第二,天主教和政治游戏是他许多作品共同的话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和剧本,剧本《祖父与兄弟》、《大使》揭露了瑞士这个国家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复杂的经济、政治纠葛,颠覆了瑞士在二战时期的“中立国”神话,他的作品常常拷问的瑞士战争罪责问题。他认为二战历史不仅是瑞士民族的历史,也是每个瑞士家庭的历史,每个瑞士人的历史。获得 2007 年瑞士席勒文学奖的小说《四十朵玫瑰》似乎就是这样一部瑞士的近代史,霍利曼把天主教政治家生涯、二战历史和战后经济繁荣融合在一起,从一个犹太家庭的历史文化记忆出发,带领着读者去感知二次大战期间的瑞士,感知犹太人的内心世界。

就在苏黎世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还结识了女作家梅琳达·

纳吉·阿波尼(Melinda Nadj Abonji)。她看上去非常年轻,喜欢围着一一条红色的围巾,脸上总带着微笑。她的代表作是《鸽子飞去》(2010),这部作品使她获得德国图书奖,瑞士图书奖双奖殊荣,她总是说“真的没有想到”。阿波尼是一只从远方飞来的鸽子,1973年,她随父母从当时的南斯拉夫辗转来到苏黎世,自传小说《鸽子飞去》叙述了科奇斯一家从塞尔维亚北部少数民族部落来到苏黎世,融入瑞士社会的一段跨文化记忆,以及主人公对童年的追忆。塞尔维亚和瑞士的叙述场景转换犹如现代与传统、异化与亲情、机器与自然之间的转换,“童年的气氛就是故乡”这句话里蕴含着作家的故乡观。阿波尼用女性的直觉视角和文化敏锐观察了瑞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这部小说对被人遗忘的塞尔维亚小村和大都市苏黎世做了黑白对比,主人公从对比中显露出对工业文明和传统价值的冲突的高度关注。

2012年,我们终于见到了瑞士的夏天。应瑞士文化基金会之邀,我和同事们一起来到了美丽的阿尔卑斯山麓,那里的绿色牧草地、蓝天白云和远方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峰相得益彰,一片人间仙境的景色,令人赞叹不已。我们参加了离洛桑不远的洛伊克巴德国际文学节,旋即又去了阿彭策尔的“文学之家”讨论文学翻译,我们以瓦尔泽的方式去“望登”,德语中把山地散步称为“wandern”,我喜欢把这个词译成“望登”,登上阿尔卑斯山,漫步在嫩绿色的牧草地上,远远望去,山峦起伏,四处不停地传来叮叮当当的牛铃声:我想起了小说《没有旋律的年代》中的旋律,想起了作者彼得·韦伯(Peter Weber)。他没有来。

几天后我们在苏黎世湖畔聚会,韦伯来了。他是从德国赶来

的,风尘仆仆,我们一起谈论了他的代表作《没有旋律的年代》。那是一部反小说,他用了散文的形态、断裂的语言,还有几乎是爵士乐的嘶哑和窒息般的节奏写就了这部小说;一段段的叙述各说各的,叙述场景随意置换,传统的叙述主体遭到质疑,往往是牛、昆虫、动物、物体反客为主,成了叙述主体;语言变成了音乐,音乐却没有曲调。我问他,他是不是在变调,他诡异地笑了一笑。其实他是最乡土的,他的旋律和曲调是瑞士阿尔卑斯山上的大自然,是它发出呼吸声,假如我没有去过阿彭策尔,那我不会理解韦伯。

我跟阿兰·克劳德·祖尔策(Alain Claude Sulzer)也是2012年夏天在苏黎世湖畔聚会时初次见面的,他告诉我,他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不来梅、柏林等德国城市生活了近二十年,现在他住在巴塞尔、阿尔萨斯和柏林。在这点上,他与许多当代瑞士德语作家一样,大多是“狡兔三窟”,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也具有宽阔的视野。祖策尔写过许多小说,如中篇小说《安娜的面具》(2001),《私人时刻》(2009),《为了错误的时间》(2011)。

小说《完美的侍者》是祖尔策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2008年在法国获得“美第西斯外国作品奖”,从而确立了祖策尔在国际文坛的地位,米兰·昆德拉、多丽丝·莱辛、翁贝托·艾柯等著名作家也曾获得过这项大奖。这部小说以细腻优美的语言描写了人类永恒的情感——爱情;向读者记述了20世纪三十年代一个旅馆侍者的情感往事,表达了“完美的侍者”和“不完美的情感生活”这一矛盾主题。祖策尔的小说不仅表达了爱情的美好,也表达了往往与美好同在的背叛与伤痕。

近年来,瑞士当代德语文学似乎显现出一种总的趋势。首先,

文化记忆成为了作家们所喜爱的创作主题,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作家几乎都在关注着集体和个体的文化记忆问题,他们的作品似乎都在与遗忘进行着抗争。他们所展现的文化记忆有些是历史政治事件的具体折射,有些则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点滴经历。他们的作品几乎都远离了政治说教和宏大叙事,而常常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日常的生活细节,去反思主体的人生经验。其次,这些作家已经无意识地显示出罗切尔意义上的“世界情怀”,他们的作品叙述的往往是显微镜下的局部,甚至是细部,但是所放大的却是人类伦理的严肃问题,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因此也是严肃的。

是为序。

另:值此“瑞士当代小说译丛”出版之时,我谨代表译者向瑞士文化基金会、柏林文学研究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浙江大学 范捷平

2010年2月于杭州桂花城

2012年8月修改

历史记忆 (译本序)

《四十朵玫瑰》是瑞士当代作家托马斯·霍利曼(Thomas Hürlimann, 1950—)的一部长篇家族史小说。就像他的很多作品一样,霍利曼总是喜欢让叙述主体戴上形形色色的文学面具,将似是而非的“自我”和“自我经验”编织到文本中去。实际上,这部小说只是套用了霍利曼家族历史以及他个人的成长史,作者的用意在于以历史记忆的方式书写一部瑞士现代史。

女主人公玛丽是瑞士某小镇的一个犹太家族最后成员。小说的叙述主体以聚光灯的方式集中展现了外来家族和玛丽个人命运在瑞士现代社会中的跌宕起伏。在这部小说中,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激烈碰撞,瑞士社会的各种矛盾、政治斗争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飞速旋转变迁,历史碎片时而像一朵朵绚丽的火花,稍纵即逝,时而像一尊尊沉重的历史雕塑,让人驻足留步,深思不

已。小说在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玫瑰的凋零、家族的败落中结束。

托马斯·霍利曼出生于瑞士楚格市一个笃信天主教的政治望族家庭,父亲汉斯·霍利曼在1974至1982年间曾担任瑞士联邦委员会委员,并于1979年出任瑞士联邦总统一职。母亲玛丽-特雷斯·杜福特出生于俄罗斯犹太服装商家庭,舅舅是著名的圣·加仑天主教图书馆馆员,杜福特家族的祖先虽然是犹太人,但后来成为瑞士基督教天主教人民党的元老。霍利曼自己则在少年时代被送进天主教会寄宿学校,失去了天真无邪的童年快乐,他有个弟弟,二十岁时患癌症去世。所有这一切都在小说里重现,然而,《四十朵玫瑰》又像作者之前的家族小说《大猫》(Der Große Kater)、《斯塔格小姐》(Fräulein Stark)那样,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社会小说。《四十朵玫瑰》的出版意味着霍利曼的“家族三部曲”大功告成。但也许不能忽视,霍利曼虽然喜爱凭借家族史料来进行文学创作,但他更加喜爱文学虚构和文学想象。

《四十朵玫瑰》发表于2006年,次年获得瑞士席勒文学奖。作者善于从女性敏感、细腻的视角出发,有时甚至从女性近乎惆怅和多愁善感的身体和心灵感知出发,去触碰瑞士普通犹太家庭尘封的历史文化记忆,带领着读者去感知战后的瑞士社会,感知欧洲犹太人和犹太族群的内心世界。

霍利曼在谈及这部小说的时候曾多次说过,传统家族的终结象征着瑞士现代社会最大的价值观变迁,他说:“正统家族的消亡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融入和消亡、成长与死亡、爱情与凋